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CAMBRIDGE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

语言、行为、解释文集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 著
J.B. 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 / 编译
孔明安 张剑 李西祥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

语言、行为、解释文集

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 著
J.B. 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 / 编译
孔明安 张剑 李西祥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1e, 9780521280020 by Paul Ricoeu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hn B. Thompson, first published by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致 谢

当我担任剑桥格腾（Girton）学院副研究员的时候，我已开始着手编辑这本文集。社会科学家的 SSRC/CNRS 的研究交换项目的资助，使我得以在巴黎有暇翻译完这本文集的大部分。这本文集翻译工作是在我担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客座研究员的第一年完成的。我要感谢学院对我的支持。

我从其他人的评论和批评中获益良多，他们分别是 K. 麦克罗林（Kathleen McLaughlin）、D. 派劳尔（David Pellauer）和 M. 奥德特（Michel Audet）。他们三人全部或部分阅读了我的大部分手稿，并给出了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同时，我也从 D. 黑尔德（David Held）、S. 卡佩尔（Susanne Kappeler）、M. 巴福特（Mike Barfoot）和 A. 亨德利（Alison Hendry）那里接受了有益的建议，对于 A. 吉登斯在我工作的每一个阶段所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感激不尽。我尤其对 P. 利科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乐意而慷慨地提供了有关资料，从而使本书得以形成。当然，翻译中的任何错误，只能归咎于我自己。

本文集中的所有论文的重印都获得了许可。原初发表的细节如下：



“La tâche de l’herméneutique” (《诠释学的任务》), in *Exegesis. Problèmes de méthode et exercices de lecture* (《诠释: 方法论问题与阅读训练》), edited by François Bovon and Grégoire Rouiller (Neuchâtel: Delachaux et Niestlé, 1975), pp. 179–200. 英文翻译见 *Philosophy Today* (《今日哲学》), 17 (1973), pp. 112–28.

“Herméneutique et critique des idéologies” (《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in *Démystification et idéologie* (《无神论与意识形态》), edited by Enrico Castelli (Paris: Aubier Montaigne, 1973), pp. 25–64.

“Herméneutique et phénoménologie” (《诠释学与现象学》),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现象学研究》), vol. 1, edited by Ernst Wolfgang Orth (Freiburg: Karl Alber, 1975), pp. 31–77. 此论文的部分译文见 *Noûs*, 9 (1975), pp. 85–102.

“La fonction herméneutique de la distanciation” (《间距的诠释学功能》), in *Exegesis: Problèmes de méthode et exercices de lecture* (《诠释: 方法论问题与阅读训练》), edited by François Bovon and Grégoire Rouiller (Neuchâtel: Delachaux et Niestlé, 1975), pp. 201–15. 英文修订本见 *Philosophy Today*, 17 (1973), pp. 129–43.

“Qu’est-ce qu’un texte? expliquer et comprendre” (《什么是文本? 说明与理解》), in *Hermeneutik und Dialektik* (《诠释学与辩证法》), vol. 2, edited by Rüdiger Bubner et al. (Tübingen: J. C. B. Mohr, 1970), pp. 181–200. 英文缩编本见 David Rasmussen, *Mythic-Symbolic Language and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pp. 135–50.

“La métaphore et le problème central de l’herméneutique” (《隐喻与诠释学的核心问题》),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卢汶哲学评论》), 70 (1972), pp. 93–112. 英译本见 *New Literary History*, 6 (1974), pp. 95–110; and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3 (1973–4), pp. 42–58.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文本模型：被视为文本的有意义行为》), in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 38 (1971), pp. 529–62.

“Science et idéologie” (《科学与意识形态》),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卢汶哲学评论》), 72 (1974), pp. 326–56.

“The question of proof in Freud’s psychoanalytic writings”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中的证据问题》),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25 (1977), pp. 835–71.

“La fonction narrative” (《叙事的功能》), in *Etudes théologiques et religieuses* (《神学研究与宗教》), 54 (1979), pp. 209–30. 英文简略本见 *Semeia*, 13 (1978), pp. 177–202.

J. B. 汤普森

剑桥

1980年5月

编者导言

语言、意义、行为、解释和主体性的本质，都是当今诸多学科日益关注的问题。对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说，澄清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急迫而难以回避的任务。然而，在英语世界中，完成这一任务仍受制于两方面的阻碍：一是对学科界限的体制化的尊重，二是长期对有关大陆思想传统的隔绝。毫无疑问，对利科著作的日渐了解将极大地有助于克服这些障碍。作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领军哲学家，利科在诸多令人称奇的不同话题方面书写了具有原创性和权威性的著作。在最近的几年，他更为直接地关注语言问题，开始与诠释学的传统进行持续的对话。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关注意义问题^[1]，利科与他们的对话，形成了本文集论文的背景。

为了充分评价利科目前著作的意义，有必要对他的全部著作做一透视。在此篇导言中，我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全景式的视野。一开始，我将简单地概述一下利科的生涯。在第二部分，我将追踪利科思想的演进，从利科早期意志哲学的目标经过其与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的遭遇，一直到最近对文本理论的关注。在第三部分，我将勾勒



一下利科当前著作的核心主题。最后，在第四部分，我将概述一下本文集中出现的主要论点。应该说一下，从一开始，我们并不打算对利科的著作做一全面式的考察。我会强调某些论文，这将牺牲其他论文，或利科著作中的有些论文，例如，我基本上不考虑他有关教育和神学问题的论文。^[2]还应该说明的是，无论利科的思想多么重要，但我并不相信它们并非无懈可击；但这里并非是我表达我的保留意见之场所，我会在其他地方另文撰述。^[3]这里，我的目的就是利科的观点做一个主题化的简短阐述，希望有助于英语世界富于同情地接纳其著作。

—

利科 1913 年出生于威伦斯，利科开始其哲学生涯之时，适逢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和马塞尔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占据欧洲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的时候。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当利科在索邦（Sorbonne）就读研究生的时候，G. 马塞尔那时正在巴黎工作。马塞尔的思想对利科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它引导利科形成了一种融合自由、有限性和希望的实在本体论。然而，利科相信，目标的追求要求一种比马塞尔和他的学生所采用的更为严格和系统化的方法。利科在胡塞尔现象学著作中发现了这一必不可少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科在德国被俘入狱，他获准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的著作。他为雅斯贝斯的思想所打动和吸引。他发现雅斯贝斯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马塞尔很接近。战后，利科与他狱中的一位朋友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共同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概述文章《雅斯贝斯及其存在哲学》（1947）。同年，利科发表了他自己有关《马塞尔与雅斯贝斯》的研究文章。在战后的前几年，利科还完成了对胡塞尔《观念 I》的翻译和评述，并因此确立了自己在现象学方面引导性的权威地位。

1948年，利科被选为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大学哲学史（协会）的主席。他每年都专注于阅读某位大哲学家的著作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和尼采。他沉浸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这使利科不再专注于那时因萨特和梅洛-庞蒂而盛行的“存在主义”或“存在现象学”。因为一方面，利科变得越来越关注反思哲学的发展，该哲学通过对方法的反思以探求真正的主体性，由此可以理解存在。另一方面，利科变得越来越相信，必然性也即自由，它是人类存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对于意志哲学，利科雄心勃勃且极富原创性的研究，显现了意志哲学对其思想的混杂影响。在其研究的第一卷《自由与本质：意志与非意志》（1950）中，利科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探讨马塞尔所谓的“肉身生存”的意志维度。意志哲学的第二卷的书名为《有限与罪恶》，于1960年分两册出版，一册名为《易犯错的人类》，另一册名为《恶的象征》。在这两本书里，利科脱离了其严格的现象学方法，转而追求意志问题，进入到了人类犯错和失误的模糊地带。在其一开始研究意志哲学的时候，利科勾画了第三卷，也即最后一卷的任务，即致力于“意志的诗学”。然而，他并没有很快展开这一任务，反而开始考问两个曾是名声不佳的学科：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

1957年利科于索邦大学受聘主持一般哲学讲座。此时，巴黎的学术氛围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正在消退，弗洛伊德和索绪尔正在取而代之。利科并没有追随这一潮流；他的倾向与巴黎的这一时髦仍保持着距离，其观点也深深地植根于现象学的传统。然而，利科也不能漠视这一变化，因为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为引导他长期以来研究意志哲学的问题提供了方法，也为有关罪、象征主义（symbolism）和主体问题提供了方法。因此，利科遭遇到了直接的和强有力的挑战。他那本著名而得到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著作《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于1965年出版。1969年他又出版了《解释的冲突：诠释学论文集》，该著作包括了他有关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许多论文。



1966年利科选择前往南特（Nanterre）大学任教，并于1969年3月被该校任命为系主任。1970年，由于学生占领南特大学，以及随后而至的警察介入，利科辞去系主任，前往卢汶大学任教。1973年，他回到南特大学，并在那里担任芝加哥大学的兼职教授。同时，他还兼任巴黎现象学和诠释学中心主任。正是在此期间，利科全身心地专注语言问题，并与诠释学进行深入对话。他对隐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并于1975年出版了《隐喻的法则》。他还在相关方面撰写论文，笔耕不辍。利科的传记有力地见证了其思想的高产，包括现在的十几本书和几百篇论文。在导言的后两部分，我要从利科对意志哲学的原初研究开始，对其重要文集中的核心主题加以简单的勾勒。

二

意志哲学

利科意志哲学的目标是反思人类生存的情感维度和意志维度。因此，这一哲学聚焦于诸如行为和动机、需求和欲望、快乐和痛苦等问题。利科最初是从现象学的视角切入这一问题的，这个视角就是试图描述现象显现的方式，并将该显现模式与意识的主体化过程相关联。在从现象学视角切入意志哲学的维度中，利科使自己远离了那些存在主义者和胡塞尔自身立场的研究工作。因为利科批评他们过分专注于对日常经验的生动描述。他坚持认为：“起码在早期阶段，现象学必须是结构的。”^[4]然而，利科同样激烈地批评胡塞尔将认知（perception）视为意识的运作范式的倾向。在拒绝这一“逻辑的偏见”中，利科试图使胡塞尔的方法超越其唯心主义的起源，把它运用于人类经验的那些领域，这些人类经验就处于意识生活的边界地带。

利科意志哲学的第一个阶段体现于他的《自由与本质》一书中。在这一研究中，利科试图在“本质可能性”的层次上，也即从日常生活的偶然特征中抽象出来的层次上，揭示意志的基本结构。这一层次

上所揭示的是，意志结构的特征取决于意愿（voluntary）和非意愿（involuntary）的基本相互性。这一主体与客体、自由与本质的二元论并非原初的，而是一种现象学描述必须探究的态度。通过漫长而错综复杂的分析，利科表明，在意志行动中，意识如何附着于非意愿的生活，相应地，非意愿的生活成分如何附着于“我想要”（I will）。因此，意志行动涉及指向当事人权力范围内的未来行为的决定；但这一决定是建立在动机（motive）的基础之上的，而行为则是通过身体器官加以调节的，意志行动作为一个整体是以当事人必须认可的特征、无意识和生活为前提的。然而，将身体重新整合进意识，将意识重新整合进身体，并非是协调的。意愿与非意愿的统一性是一部“剧本”、是一场“辩论”，它预示的不是某种现实的，而是有限思想的妥协。在这一有限思想的基础上，我们的自由真正呈现了其本质内容，“自由是人的，而非神的”^[5]。

在意志哲学的第二部著作《有限与罪恶》中，利科去掉了某些方法论的论述，这些论述限制了他早期对本质可能性的分析。这一卷的第一本书是《易犯错的人类》，它开启了走向构成恶的场所的人类生存特征的运动。这一特征就是“易错性”（fallibility）；它可以被视为失误（fault）的线索，视为建构上的弱点，它引起了意志基本结构的中断或扭曲。因此，易错性并非是《自由与本质》中所揭示的特征的延续，在那里，利科回忆说：“我们勾勒了一个罪恶和天真无邪的人类可能扮演的无差异的画面。”^[6]因此，把握这一新维度就要求方法论的转换。分析的目标不再是通向现象学描述的本质结构，而是必须通过对不定综合加以反思，回溯性地解决内在偏差（aberration）。例如，反思揭示了，对财产、权力和值钱物的最初热情被悬置于有限的快乐一极与无限的幸福的另一极之间，结果是，每个人都要承受无尽追求的威胁。通过这样的反思，利科力图确定包括恶的可能性的人类生存的那些方面，因而就为探讨失误的现实性开辟了道路。

从可能性到现实性，从易错性到失误的过渡，完成于利科的《恶



6 的象征》一书中，该书是《有限与罪恶》的第二本。这一动向再次要求一个方法论的切换。因为失误的现实性并不能在经验的完满性中被直接把握，而只能通过表达经验的语言才能解决。本质结构的描述，以及对不定综合的反思，因而就让位于象征和神话的诠释学。利科开始其对恶的最原始表达的探讨，也即对“忏悔（avowal）语言”的探讨。语言完全是“象征”的，它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即谈论罪（guilt）或恶（sin）的方式是间接的、比喻性的，需要对之加以解释。虽然对象征与神话的解释来自于象征和神话，但这一解释并不等同于哲学反思。尽管如此，解释为反思铺平了道路。因为就像利科指出的那样：“使我相信的是，我们必须从象征开始思考，而非在象征之后思考……象征建构了生活于人之中的话语的显现基础。概而言之，象征引发了思考。”^[7]因而，诠释学就是通向哲学反思的道路，是以如下假定为前提的反思，这一假定就是：通过遵循象征意义的指示，人们将会达到对人之生存的更为深刻的理解。

精神分析的考察

在利科有关意志的研究中，解释的出现是一个关键阶段，它引导利科进入对精神分析的考察。因为如果诠释学就是通向哲学反思之途，那么，反思并不能规避解释的冲突。正如利科在其《弗洛伊德与哲学》一开头所解释的那样：“并不存在一般的诠释学，也没有诠释的普遍准则，只存在有关解释规则的不同或对立的理论，诠释学的世界内在地与自身不同。”^[8]因此，根据这一观点，诠释学就被理解为解释者以信息的方式致力于意义的恢复。这种诠释学通过信仰和倾听的意愿而获得了生命，其特征体现为尊重象征以揭示神圣。但根据另一种观点，诠释学被视为以伪装的形式向解释者显现的意义的去神秘化。这类诠释学通过怀疑某种特定东西的怀疑主义而获得生命，其特征体现为对作为现实伪装的象征的怀疑。利科指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实践的正是第二种诠释学。这三位“怀疑大师”是以某种“错误”来看待意识内容的；这三者的目的是通过还原的解释和批判

来超越虚假。

由于将精神分析定位于诠释学的领域，利科展开了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系统阅读。这一阅读包括了三个基本循环，每一个都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第一个循环开始于 1895 年的“设想”（project），它包括梦和神经症候的解析，终结于利科所谓的“第一个地形学”的系统状况，即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在这一循环中，主要关注点是精神分析的话语结构，它将自身显现为力的陈述与意义陈述的混合物；正如利科反复声称的那样：“这一混合话语并非因其欠清晰而成为模糊话语：当我们阅读弗洛伊德著作（我们可以称之为欲望的语义学）时，（精神分析的）话语紧紧把握住了我们发现的现实。”^[9] 阅读的第二个循环涉及弗洛伊德思想向文化领域的扩展，这一扩展回应于原始模式并终结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第二个地形学”中。最后，在第三个循环期，利科探讨了因死亡本能的引入而导致的巨变（upheaval）。这一死亡本能既完善了文化理论也完成了对现实性原则的解释，但这也把弗洛伊德推入了由厄洛斯（Eros）、塔纳托斯（Thanatos）和阿南柯（Ananke）诸神支配的神话领域。^①

欲望的语义学观点为利科确定精神分析的认识论地位提供了参照。有些批评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没有满足科学性的基本标准，还有一些学者试图重构该理论以便使之符合那些标准，为了回应他们，同时也与他们的观点相反，利科声称，所有这些批判和重构的论调都违背了精神分析的根本。因为精神分析并不是处理行为事实的观察科学；相反，它是有关再现的象征与原始本能之间的意义关系的解释性学科。因此，判断精神分析的概念，不是依据经验科学的要求，而是“根据其作为分析经验可能性的条件的地位，也就是经验运作于言谈（speech）领域而言的”^[10]。对精神分析中语言及其意义的难以还原的作用的承认，使利科更接近于拉康（J. Lacan）及其追随者的立场。然而，利科批评拉康试图把压缩（condensation）解释为隐喻，把置换

① 厄洛斯、塔纳托斯和阿南柯分别为古希腊的爱神、死神和命运女神之母。——译者注。以下所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 (displacement) 解释为转喻。这样的企图没有考虑到精神分析的能量维度，因而，也没有成功解释障碍，即压抑的障碍，它把日常语言与无意识
- 8 意识的准语言分离开来。因而，在利科看来，行为主义者和拉康的概念都没有对作为欲望的语义学的精神分析的特殊性给予合理辩护。

利科对弗洛伊德著作研究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哲学反思的层次上。支配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有两方面：（1）精神分析的混杂话语如何进入反思哲学？（2）当严肃地对待意识的面具时，反思主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体现于下述观点：“对分析话语哲学位置的定义取决于主体考古学的概念。”^[11]这一概念让位于另一个意义代理的优势，即欲望的出现，并承认欲望对当下意识的剥夺。然而，欲望的获得只有通过其展现自身的伪装，通过对欲望符号的解释，人们才能俘获其出现，并因而得以使反思获得其已经失去的古老遗产。利科期望通过反思扩展所揭示的隐含的目的论，通过对精神构形的进一步综合，来补充弗洛伊德主义的回溯分析。的确，考古学与目的论的内在辩证法——倒退与前进的辩证法，其本身就根植于真正象征的多元决定的结构中。所以，利科得出了有关弗洛伊德哲学反思的结论，并提出，象征的复杂建构包括了解决解释冲突的关键。

与结构主义的抗衡

利科思想中日益增长的语言的重要性成为他与结构主义真正抗衡的动力。“结构主义”一词指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一直在法国流行的各种学说，它与诸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Lévi-Strauss）和阿尔都塞（L. Althusser）这样的作者相关联。这些学者，以及其他学者的各种不同的贡献，通过某个潜在的语言模式，以及对结构主义方法有限性的界定的预设而统一了起来。这一模式最初是由索绪尔建构的，但利科在丹麦语言学家赫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的著作中发现了更多有力见解。借助于赫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绪论》，利科把语言模式的前提概述如下：首先，结构主义假定，语言是能被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结构主义对

系统状态的科学与变化科学进行了区分，并使后者服从于前者。再次，结构主义模式假定，在任何系统状态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概念，只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语言“变成了一个由各自差异所界定的符号系统”^[12]。最后，结构主义把符号群视为内在相互依赖的封闭的自主系统。正是遵循着这些假定，所以，对结构主义来说，一个符号的界定不是根据它所代表的对象，而是根据它与其所属系统的相同层次上的所有其他符号的关系。

在诸如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语言模式被转换(transpose)至其他的对象领域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一置换的辩护的理由是：相关领域自身也是一个交往系统，因而，其与语言是可比较的。例如，血亲关系就构成了对立两极的系统，其中，女人在家族和部族中被交换的方式类似于个体间词语相交换的方式。类似地，神话也可以被视为构成单元系统或“神话素”(mythemes)，它们通过与语言规则相类似的法则得以内在关联。然而，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远远超越了这些小心翼翼的置换，并把语言模式运用于整个思维层次上。这一层次就是“野性思维”的层次。有关这一思维层次，利科评论道：“它给出了次序，但它并没有思考自我。”^[13]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野性思维就是一个“无意识的”次序，可以把这一次序客观地分析为纯粹中的差异系统。

通过对加于语言模式的假定的有限性的反思，利科发展了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他指出，在把自己置于上述假定基础上的同时，结构语言学没有考虑到诸多重要现象。例如，它没有考虑到，言说(speaking)行为不仅是个体的表现行为，而且也是新表达方式的自由创造；它也没有考虑历史，因为历史并不仅是从一个系统状态到另一个系统状态，而且是一个过程。借此，人类通过其语言的生产来生产自身，并生产其文化。不仅如此，结构主义也没有考虑到，语言的原初目的或意向就是通过言说内容来论及他物。语言既拥有理想的含义，即言说内容，也拥有真正的指称，即谈论他物。在这一超越的运动中，语言一下子越过了两个门槛，因此，语言“抓住了现实，并表达了思维



- 10 对现实的把握”^[14]。对上述现象的忽视导致利科质疑语言模式的最初假定，也即语言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太容易忘记一点，即对象是相对于结构主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言的。语言被绝对化为一个对象，而且，结构主义远远越过了其有效的边界，因而它阻碍了这一交流过程，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言谈内容是对他物的谈论。

对结构主义有效性边界的逾越，这一趋向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特征。利科一开始就试图证实这一逾越，他指出，从语言模式向野性思维的过渡是通过特殊立场的方式而完成的。由列维-斯特劳斯所引证的例子都来自于特定的人种学材料的领域，这很容易对这一领域进行重新组合。然而，如果要从不同的思维传统中，从犹太人、古希腊人和印裔欧洲人中抽取例子，那么，离开了结构主义方法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这些例子看来都不可能得到分析。那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那些难以还原的意义的残余，将成为诠释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对有效性边界的类似逾越也体现在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学者所引发的，从结构主义科学到结构主义哲学的未加言明的运动中。利科声称，这一运动注定失败。因为，如果结构主义排除了自我反思的可能性，那么它就根本不能把自身建构为某种哲学。“在我看来，某种被假定为无意识的次序不过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即通过自身与自我理解抽象分离的阶段。次序本身被认为处于自身之外。”^[15]然而，真正的反思哲学必须善于接受结构主义的方法，把自身的合法性确立为理解自我和理解存在中的客观阶段。这一规则形成了利科最近有关语言理论和解释理论研究的主要参照点。

三

话语与创造性

意志哲学、精神分析的研究以及与结构主义的抗衡，都提出了有关语言本质这一基本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利科力图发展一种为